

《石巢传奇四种》创作考辨

孙 书 磊

《石巢传奇四种》作者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皖髯。安庆府怀宁(今安庆市)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官户科给事中。天启四年(1624)以谋迁吏科阴结魏忠贤,又惧东林党攻己,未滿一月即请归。崇祯元年(1628)起光禄卿。崇祯二年(1629)阮大铖名在逆案,削职为民,后流寓金陵。弘光时,起兵部侍郎,进尚书。清兵渡江,走江东,不久降清,从攻仙霞岭暴死。阮大铖生前名收逆案,南明时期又声名扫地,《明史》将之作为品行不端的小人列入《奸臣传》。《明史·艺文志》以及各类丛书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皆坚持“撰人品学不端正者不收”的编纂原则,^①将明末诗人、戏剧家阮大铖的诗文、戏剧作品拒之门外。然而,客观公正的文化史研究却不应以人废言。阮大铖一生创作了11种传奇,其中包括存世的《石巢传奇四种》即《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燕子笺》等4种,和已佚的传奇《井中盟》、《老门生》、《忠孝环》、《桃花笑》、《狮子赚》、《翠鹏图》、《赐恩环》等7种。虽然从现存的戏剧作品看其艺术成就很高,但是由于人们头脑中文品如人品的思想作祟,其作品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7种传奇的遗失已经造成了戏剧史上的遗憾,而现代学者对《石巢传奇四种》创作状况的一些认识更有予以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吴梅先生认为,“圆海四记(孙按:指《石巢传奇四种》),皆作于闲废金陵之日。”^②对阮大铖素有研究的当代学者徐凌云、胡金望二位先生也认为,“阮大铖四种曲,据其序跋推知,……写作地点在南京附近之姑熟和南京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③然而,《石巢传奇四种》的创作在时间、地点上都存在着差异,这样的认识非但有失笼统,也欠准确。

一

在今存明刊本《石巢传奇四种》每种传奇的序跋文字中留下明确时代记载的,只有《春灯谜》和《燕子笺》。

明崇祯间吴门毛恒《石巢传奇四种》刻本之《春灯谜》题为《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首载署“崇祯癸酉三月望日百子山樵撰”的序文,序曰:“其成之月余,人争速之,即撰者亦自谓速也。”末载作者《自跋》云:“癸酉三月望日,编《春灯谜》竟,偶书于咏怀堂花下,百子山樵手书。”崇祯癸酉即崇祯六年(1633),可见,《春灯谜》的创作当始自崇祯六年(1633)夏历二月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历时一个多月。

吴梅先生《〈春灯谜〉跋》说,“此记《提唱》折又云‘百花深处咏怀堂’,‘百花深处’者,即石巢园之一景。是可知四记之成,皆在屏处南都之际。”^④由咏怀堂在石巢园,石巢园在南京,而推定《春灯谜》的创作在“屏处南都之际”,看似逻辑严密,实则论据不足。

南京图书馆典藏善本明崇祯刻本《咏怀堂丙子诗》专收阮大铖丙子年即崇祯九年(1636)的诗作,其中有《归次咏怀堂哭先恭人》诗一首:“避地且归来,吾芦宛仍昔。风喧门柳青,雨止江云白。野鼠各缘桁,山鸡自啼栅。麦菜熟已齐,蓬蒿乱无摘。巢燕何奴轩,顾我反成客。堂中机杼声,堂前綦履迹。徽音俨如在,兹灵复奚适。一身等飞藿,百念顿攒戟。长号安可持,泪与莓苔碧。”紧跟该诗之后,又有《初归感旧赋》、《春寒感怀先恭人》、《江上还石巢》、《还江上草

堂東史使君道邻》等诗。其中,《春寒感怀先恭人》诗的末两句云:“怜无慈母缝,使我中怀伤。”先恭人指诗人的过世母亲。由于《咏怀堂丙子诗》是按照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编排的,所以,《归次咏怀堂哭先恭人》、《初归感旧赋》、《春寒感怀先恭人》、《江上还石巢》、《还江上草堂東史使君道邻》排列在一起,恰好记录了阮大铖因母亲去世而从南京奔丧回到怀宁的事迹。《归次咏怀堂哭先恭人》中的咏怀堂当然在怀宁而非南京。“避地且归来,吾芦宛仍昔”,从“避地”南京归来,咏怀堂虽然宛如昔日,然而已经物是人非,“堂中机杼声,堂前綦履迹”,母亲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再次引发了作者的悲恸:“长号安可持,泪与莓苔碧。”

与之相关,作于丙子年间的《江上还石巢》中的“石巢”也非南京的石巢园。证据有二:

其一,《咏怀堂诗》卷1的一首诗《鸠岭草堂酬方式谷、肃之、姚绳先见过》提及“鸠岭草堂”,既为“见过”,那么“鸠岭草堂”并非他人的草堂,而是阮大铖自己建在怀宁的草堂。与《江上还石巢》诗并列的《还江上草堂東史使君道邻》之“草堂”也当为阮大铖在怀宁的“鸠岭草堂”,那么《江上还石巢》中的“石巢”自然也就在怀宁。

其二,所收诗歌作品创作时间早于《咏怀堂丙子诗》的《咏怀堂诗》卷1有《由佛岭至龙泉庵旋憩石巢》、《从石巢至平等庵宿》等诗。佛岭在怀宁附近,龙泉庵、平等庵也为怀宁的庵寺,这些都是阮大铖乡居时常去的地方,石巢距离佛岭、龙泉庵、平等庵等地方并不远。《咏怀堂诗》卷1还有一首诗《月夜石巢宿灵公故房感旧》,诗中所谓“灵公”即阮大铖的先人,石巢中有“灵公故房”,说明石巢曾是阮大铖先人的旧居。《咏怀堂诗外集》所收作品的创作时代与《咏怀堂诗》相当,^⑤即崇祯八年(1635)之前也就是阮大铖罢官乡居至移居南京之前,《咏怀堂诗外集》甲部《久客归坐雪石巢开门人邓简之书并见怀作》抒写了作者旧客他乡之后返回石巢居所时的欣喜。可见,在丙子年之前,石巢就是阮大铖在怀宁的居室。后来移居南京,

阮大铖将南京城内西南隅的寓所取名为“石巢园”，表达了其对怀宁故居的怀念，园名并非新创。

既然咏怀堂在怀宁，而且怀宁也有石巢，那么，从《春灯谜》第一出《提唱》末所唱[西江月]中的“百花深处咏怀堂”一句推定该剧是作者蜚居南京时创作的，论证就有失臆测了，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

崇祯元年(1628)，阮大铖在做了短暂的光禄卿后即罢官归里。崇祯二年(1629)定逆案，阮大铖榜上有名，论徒赎为民，但没有马上流寓金陵，而是继续在家乡安徽怀宁生活了八年。八年中，阮大铖在家乡发起成立“桐城中兴社”，与复社对抗。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记载，“甲戌桐城民变，乙亥流寇猖獗，江以北之巨富十来其九”，“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南”。甲戌即崇祯七年(1634)，“桐城民变”指桐城王文鼎、汪国华农民起义军攻破县城，锋芒直逼安庆。“民变”发生时，阮大铖并没有马上逃往金陵，而是在家乡积极协助镇压。《咏怀堂诗》卷4有《石言十二首》，每首诗都有小序，其二序曰：“春中闻流寇警，余倡乞师议甚力，里中无赖谓无病呻，毒詈之，兹潘将军可大捐赀募士至，而桐变赖以镇，议非欤？”后来为了躲避“民变”打击，阮大铖也像其他巨室一样移居南京。到了南京不久，即将自己在里中八年所作的诗结集刊刻，诗集刻成，授意叶灿作序。叶灿在《〈咏怀堂诗〉序》中云，“去年秋，里中忽遘二百七十年所未有之变，公眦裂发竖，义气愤激，欲灭此而后朝食，捐橐助饷，犯冲飏凌，洪涛重趺，奔走请兵讨贼，有申包胥大哭秦庭七日之风，卒赖其谋，歼丑固圉，一时目击其事者无不艳羨嗟叹。”该序文作于崇祯乙亥即崇祯八年(1635)秋，正是阮大铖从怀宁移居南京的当年。

据作者《〈春灯谜〉自跋》，《春灯谜》的创作完成于“癸酉三月望日”的“咏怀堂花下”。从阮大铖的上述经历看，崇祯癸酉即崇祯六年(1633)，阮大铖尚未避居南京，而在家乡安徽怀宁。那么，《〈春灯

谜》自跋》所谓“咏怀堂花下”和《春灯谜》的《提唱》折所谓“百花深处咏怀堂”的“咏怀堂”都指作者家乡怀宁的“咏怀堂”。吴梅先生关于《春灯谜》创作时间、地点的推论不攻自破。

二

《石巢传奇四种》中成就最高、在当时乃至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燕子笺》。

吴梅先生根据《燕子笺》第一出《家门》副末开场所吟[西江月]中“春来秋去酒樽香,烂醉莫愁湖上”句,认为该剧与《石巢传奇四种》中其他三种一样,其创作也都在“屏处南都之际”。^⑥该剧今存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所收本的韦佩居士序,署“崇祯壬午阳月”即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郭英德先生据此认为,“此剧作于是年十月以前”。^⑦徐凌云、胡金望二位先生也只是泛泛地指出,《石巢传奇四种》的“写作地点在南京附近之姑熟和南京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⑧对于《燕子笺》的创作时间、地点,研究者往往因未作具体的研究而语焉不详。

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所收本《燕子笺》的韦佩居士序既署为“崇祯壬午阳月”,那么,将《燕子笺》的创作完成确定为崇祯壬午阳月即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以前,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这只是给该剧的创作时间划定一个较大的范围,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定位其创作的具体年代。

金嗣芬《板桥杂记补》卷上“记人”之“董小宛”条记载了崇祯壬午中秋之夜如皋才子冒襄与金陵名妓女董小宛的相聚情景:“一时应制诸名贵咸置酒高会,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于河亭演怀宁新戏《燕子笺》”。金嗣芬《板桥杂记补》源于前人的记载,这段中秋观剧的情节早在冒襄本人撰写的专忆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壬午,……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渡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

寒修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冒襄的同时代人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也说:“壬午……八月初,姬复孤身挈一妇从吴买舟,江行逢盗,折舵入苇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复停舟郭外,候辟疆闹事毕始见之。一时应制诸名贵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于河亭,演怀宁新剧《燕子笺》。”

崇祯壬午即崇祯十五年(1642),既然该年中秋日人们称《燕子笺》为“新剧”、“新演”、“新声”、“新戏”,那么,该剧创作的完成时间应在崇祯十五年(1642)夏历八月十五日前不久。而该剧在此前多久完成才算得上是新呢?笔者在冒襄《同人集》卷3“记”中发现了冒襄的好友陈瑚所撰《得全堂夜宴记》一文,该文记述庚子年即清顺治十七年(1660)陈瑚过访冒襄,冒襄开全金堂夜宴陈瑚,席上冒襄家班表演《燕子笺》,引起陈瑚对崇祯旧事的追忆:“崇祯壬午,予游维杨。……寓鲁子载馨家,鲁子为余置酒,亦歌《燕子笺》。……予《扬州杂感》有曰:‘春衫野踏琼花观,绮席新歌《燕子笺》。’”^①鲁东铤,字载馨,明末江都诗人。查《确庵先生诗钞》卷4所收鲁东铤《淮南集》(原注:“起庚子四月尽九月”)中有《扬州杂感六首》,皆为庚子年作者在如皋冒襄家做客时回忆其崇祯壬午年间游历扬州的感受之作,其中四首有尾注,分别“吊史忠靖也”、“哭郑天玉也”、“怀鲁载馨也”、“悲隋炀帝也”。其五云:“看看宾榻藉高眠,忽忽苏卿塞外年(原注:‘一别十九年矣’)。入梦尚疑吞鸟藻,移情还记拨湘弦。春衫野踏琼花观,绮席新歌《燕子笺》。此日闻君最萧瑟,种瓜已傍邵平田。”诗尾注云:“怀鲁载馨也。”“琼花观”,扬州著名道观。该诗记录崇祯壬午年间作者游历扬州的经历:衣着春衫之时,游琼花观,观《燕子笺》,寄托了对鲁东铤的怀念。由此可知,《燕子笺》创作的完成应在崇祯壬午即崇祯十五年(1642)春季之前,而传到扬州时仍称“新歌”,则该剧的完成应在崇祯十四年(1641)末

至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间。

自崇祯八年(1635)由怀宁移居南京,到弘光元年(1645)离宁入浙,阮大铖在南京生活了10年,其间并非一帆风顺,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崇祯十一年(1638)和崇祯十七年(1644)。

一到南京,阮大铖便居住在新置的石巢园。据清·陈作霖所编《金陵琐志》三种之《凤麓小志》卷1载,“直东为水斋庵街,街尽为小门口,其南为库司坊,明阮大铖石巢园之所在也,移其名曰裤子裆。”以此考索该书所绘《金陵城西南隅街道图》得知,石巢园位于南京城西南隅,离凤凰台、杏花村以及阮籍墓不远,此处正是外来巨室聚集的地方,同时在此居住也流露出阮大铖以阮籍相标榜的心迹。在这里,他凭借自己既有的文坛影响和雄厚的经济条件,组织“群社”,谈兵说剑,招纳游侠,希图以边才扬名,以期得到崇祯皇帝的再次起用。结果,引起了东林后劲即复社成员的强烈不满。崇祯十一年(1638)秋,由吴应箕、陈贞慧、顾杲起草,侯方域、黄宗羲、冒襄、杨廷枢、万泰等为首多达140余人签名,张贴出《流都防乱公揭》,^⑩在揭露阮大铖企图东山再起企图的同时,对阮大铖大加挞罚:“此乱萌也。留都重地,岂可使奸徒匿迹!”^⑪在一片声讨声中,阮大铖被迫移居城南三十里之遥的牛首山之祖堂寺。祖堂寺是金陵南郊的胜迹,在牛首山的献花岩。民国初期胡祥翰所编《金陵胜迹志》引王士正《游献花岩祖堂记》云,“牛首献花岩幽栖祖堂寺,……阮司马大铖被废后居此寺。”阮大铖在此闭门谢客,以吟诗、作剧、观剧自娱。张岱《陶庵梦忆》卷4“牛首山打猎条”记载,“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与其弟勋卫、甥赵忻城,贵州杨爱生,扬州顾不盈……出南门校猎于牛首山前后,……看剧于献花岩,宿于祖堂。”^⑫戊寅即崇祯十一年(1638),该年秋天阮大铖由石巢移居祖堂寺,冬天张岱等人“看剧于献花岩,宿于祖堂”,招待张岱一行人的主人当然就是阮大铖。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后,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在马士英的帮助下,阮大铖很快以冠带陛见,继而起为

兵部添柱右侍郎,才结束匿居祖堂寺的生活。

从上述阮大铖在南京的活动看,创作《燕子笺》之时即崇祯十四年(1641)末至崇祯十五年(1642)初,阮大铖正生活在南京牛首山之祖堂寺,而非城内石巢园。至此,我们对于前文所引从吴梅先生到郭英德、徐凌云、胡金望诸先生关于《燕子笺》创作时间、地点的笼统认识,就有了更为明晰的辨正。

三

《牟尼合》的明崇祯吴门毛恒刻《石巢传奇四种》所收本题《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首载署“渔山子识”序文和署“香草垞禅民题于白门寓斋”《题词》。序文落款印曰“曹履吉”,^⑬可知“渔山子识”即曹履吉;《题词》落款印曰文启美,可知“香草垞禅民”即文震亨,字启美。

关于《牟尼合》的创作情况,吴梅先生说:“《牟尼合》虽避暑姑熟而作,第《叙缔》折[玉芙蓉]云:‘风光六代偏,烟树三山远。’亦不离金陵也。”^⑭吴先生的依据除了该剧作品本身提供的线索外,还根据文震亨《题词》的记载:“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题词》明确交代该剧的创作地点在姑熟。姑熟又称姑孰,即今南京附近位于其西南方向的安徽省当涂县。吴先生认为《牟尼合》作于当涂,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吴先生又说:“咏怀堂、遥集堂皆其所居,即暗隐其姓名也。”^⑮联系该剧题名《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吴先生显然是在认为,遥集堂为阮大铖在姑熟的别业,《牟尼合》就在这个别业完成。吴先生的这种逻辑推理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更无法以此为基础进而确定该剧的创作时间。

其实,阮大铖在姑熟并没有名为“遥集堂”的别业。笔者却在《咏怀堂诗外集》甲部发现题为《雨中同仁植坐元甫遥集堂饮弈兼定宛陵行》诗一首:“高馆旁罗梧竹阴,相看竟日雨沉沉。衔杯共悟忘忧旨,坐隐兼销决胜心。红叶缘阶闲饮露,黄鹂隔树细流音。敬

亭更探玄晖迹,云岭苍苍猿昼吟。”曹履吉,字元甫,号渔山子,安徽当涂人。该诗记载了一个秋季的雨天阮大铖与方仁植在姑熟曹履吉的遥集堂聚会之事。可见,遥集堂绝非阮大铖的室名,而是姑熟人曹履吉的室名。据文震亨《题词》所云“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于是,我们就清楚了:阮大铖是在姑熟曹履吉的遥集堂避暑时创作了《牟尼合》。

这在该剧中可以找到内证,而且联系曹履吉《〈牟尼合〉序》还可知道该剧创作更为具体的细节。《牟尼合》第1出《珠纲》副末开场时照例交代该剧的创作背景:“大江东去,天门之内,一座青山。有古今才子,玄晖供奉,临风捉月,于此盘桓。枳壳飞香,樱桃滴雨,青旗燕尾,酒垆寒。遥集堂,步兵子建,闲把词删。”“步兵”即阮籍,“子建”即曹植。显然,阮大铖以“步兵子建”寓指自己和遥集堂的主人曹履吉。“遥集堂,步兵子建,闲把词删”,更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与读者:曹履吉参与了该剧的撰写,至少可以认为,在阮大铖撰写该剧的过程中曹履吉曾经提供过一些意见,而且被阮大铖采纳。对于该剧的创作情况,当然曹履吉最清楚。他在《〈牟尼合〉序》中说:“(百子)自唱自板,抵十五六日,运用有成,语语由衷,半字不寄篱下。……视向之黄钟音首,到此别开洞天,而乐府之精微,乃尽拟于今秋八月。须邀何人赏听?则天门之内,一座青山,呼起谢朓青莲,百子当歌,渔山为之起舞。”原来,夏日阮大铖在遥集堂避暑时于十五六日之内完成了《牟尼合》的初稿,同年八月,阮、曹二人又在遥集堂共同对该剧进行了删订,删订时其陶醉之状正如曹履吉《〈牟尼合〉序》所云“百子当歌,渔山为之起舞”。

那么,《牟尼合》到底完成于何年?《咏怀堂丙子诗》卷上收有阮大铖丙子年间创作的《和韵酬文启美见赠》两首。其一:“销忧未敢效群公,白石狂歌意亦雄。慵寄眼光牛背上,全体生计蟹螯中。闲吟江畔枫初落,澹思篱间菊幸同。赖有青山酬赋客,萧晨莫放酒杯空。”其二:“高秋极目雁宾时,江外风烟不可知。犊鼻自怜聊复尔,

鸱夷不醉亦奚为。餐将青药心徒苦,枕到黄粱梦已危。遥忆洞庭今宛在,垞边香草系予思。”从其二首句“高秋极目雁宾时”看,这两首诗写于阮大铖失意蜇居南京的丙子年秋季。

查“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文震亨(启美)《文生小草》,得《阮集之光禄见示诸剧》诗两首。其一:“何须余子尽知公,海内谁能表大雄。自敛一秤居局外,独留万卷在胸中。云台议者终无据,天际真人迥不同。堪破世间俱是错,寓言直欲碎虚空。”其二:“自向波翻鼎沸时,挽回惟有寸心知。初焉仗马鸣当斥,既曰弓蛇影可为。宣室席皆前狡狴,新亭泪岂与安危。书生不少澄清志,敢以公当十万师。”《文生小草》刻于戊寅年冬,作品以时间为序编排,这两首诗之后有《丙子除夕客南中》、《丁丑岁朝》、《和集之先生新岁见怀之韵》等,可知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在丙子年除夕之前。而从用韵和内容方面看,阮大铖两首《和韵酬文启美见赠》诗所和的正是这两首诗之韵。既然《和韵酬文启美见赠》写于丙子年秋季,那么毫无疑问,文震亨赠给阮大铖的这两首《阮集之光禄见示诸剧》诗也是写于丙子年秋季。^⑩

从文震亨《阮集之光禄见示诸剧》的内容看,其一针对《春灯谜》,其二针对《牟尼合》,则说明丙子年秋季《牟尼合》已经完成。由于文震亨《〈牟尼合〉题词》是其看过《牟尼合》剧作后撰写的,《题词》既云“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那么,这里的“今岁”当即丙子年。《牟尼合》初稿的完成时间应是丙子年即崇祯九年(1636)夏日,同年夏历八月与曹履吉一同修改定稿。此时正是阮大铖移居南京的第二年,尚未住进牛首山。

四

对于《双金榜》的创作情况,吴梅先生只在《〈春灯谜〉跋》中约略提及,认为该剧与《石巢传奇四种》中的其他三种一样均“作于闲废金陵之日”,而未说明其创作的具体时间、地点,而且,其他学者

也都未作更多的研究。

《双金榜》前“百子山樵(即作者)漫题”的《小序》称:“此传梗概,胎结久矣。一针未透,搁笔八年。偶过铁心桥,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日而填成。”可见,该剧的完成地点如同《牟尼合》一样也在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曹履吉处,而该剧的创作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构思酝酿,然后才一挥而就。

阮大铖的戏剧,往往有感而发,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同时代的张岱指出,“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①7}吴梅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双金榜〉跋》云:“然则圆海诸作,果各有所影射欤?今读诸剧,惟《双金榜》略见寄托,顾亦非诋毁东林也。”青木正儿亦云:“此记作者用以寓其为世人误解受冤之意者。”^{①8}《双金榜》中的“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戴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以东洛为东林,以东粤为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鬼者魏也。”^{①9}皇甫敦无辜被诬,二子党争,都反映了作者在崇祯朝的际遇。作者通过皇甫孝绪以自况,表白自己虽曾攀附过魏党,但并不是其帮凶,被列逆党实属冤枉。逆案之名郁结于内,自然要发之于外,戏剧创作与演出成为阮大铖排解苦闷、表露心迹的近水楼台的首选手段。的确,阮大铖在该剧中百般解释自己所受的“委屈”,但并无讥讽东林党之意。我们知道,阮大铖在崇祯元年(1628)被罢官,崇祯二年(1629)被收入逆案,从此心有所郁,总想设法向东林、复社解释自己的“委屈”,而其最急于表明清白而又最不敢攻击东林、复社的时间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被复社成员哄到牛首山之时。

据作者自序推知,这种“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郁结于胸最早从崇祯元年(1628)被罢官时可能就开始,^{②0}至作者写完《双金榜》已经有八年了。那么,《双金榜》的完成应在崇祯九年(1636)之后不久某一年的春天,但最迟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之

前,而从上述阮大铖的经历及其心态看,最有可能是在作者崇祯十一年(1638)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了《双金榜》的创作。作者自撰《〈双金榜〉小序》对于自己“二十日而填成”的该剧十分自信:“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作者已佚作品的创作情况不得而知,就现存剧本而言,从上述的考辨得知,《春灯谜》甚至可能《牟尼合》的创作都早于《双金榜》,而作者不无自夸之意的序言又从另一角度佐证了笔者关于《双金榜》创作时间的认定。

综上所述,《石巢传奇四种》创作的具体情况是:《春灯谜》创作始自明崇祯六年(1633)夏历二月初,该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完成,历时一个多月,创作地点在作者家乡安徽怀宁的咏怀堂;《燕子笺》完成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末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初这段时间,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的祖堂寺;《牟尼合》初稿的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酷夏,同年夏历八月与曹履吉一同修改定稿,创作和修订地点都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双金榜》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某一年的春天,而明崇祯十一年(1638)作者移居牛首山之时或之后不久完成《双金榜》的可能性最大,创作地点也在安徽当涂曹履吉处。

注:

① 胡思敬《原刻豫章丛书略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⑥⑭ 吴梅《〈春灯谜〉跋》,转引自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第1399页。

③⑧ 徐凌云、胡金望《阮大铖戏曲四种·前言》,黄山书社,1993年,第2页。

④ 此说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界,如李金松先生《阮大铖〈双金榜〉中的政治影射发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云:“阮大铖闲居在南京时,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咏怀堂’。”

⑤ 据阮大铖《〈咏怀堂诗〉自序》和叶灿《〈咏怀堂诗〉序》,《咏怀堂诗》四卷刻于乙亥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

⑦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8页。

⑨ 清咸丰九年(1859)冒溶刊本《同人集》将陈瑚《得全堂夜宴记》中“鲁子载馨”误刊成“鲁子戴馨”。

⑩ 据陈贞慧《防乱公揭本末》、黄宗羲《陈定生墓志铭》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姑山事录》等相关文献记载，详扈耕田先生《侯方域反阉党阮大铖事迹考实》(《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

⑪ 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第138页。

⑫ 今存《陶庵梦忆》的较早版本清乾隆十四年(1775)硯云书屋《硯云甲编》刻本和清咸丰三年(1853)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刻本皆刻“宿于祖茔”，现代各种铅印本也都延续此说。查明代牛首山胜迹中无“祖茔”一名，若将“祖茔”解为先祖的坟茔，则既与语境不合，也与张岱身世不合。“祖茔”实为“祖坐”之误，“坐”为“堂”的古体字。

⑬ 蔡毅先生《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及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综录》皆将“曹履吉”误认作“曹履山”。

⑮、⑰、⑱ 吴梅《〈双金榜〉跋》，转引自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第1387-1388页。

⑯ 文震亨的经历为这两首诗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据文震亨的外甥孙顾苓所撰《塔影园集》之《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云，文震亨，长洲(今苏州)人，文徵明曾孙，“辛酉以诸生卒業南雍，流寓白下，……丙子文肅公薨，逾年脂车而北，就选入得龙州半刺。”文肅公即文震孟，文震亨之兄。可知，文震亨自辛酉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至丙子年的次年丁丑年即明崇禎十年(1637)，一直在南京生活。这两首诗是文震亨在南京的最后时间所作。

⑰ 张岱《陶庵梦忆·阮圆海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

⑱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12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